

# 术语滤网:中国政治话语的修辞协商范式与在地理论建构<sup>\*</sup>

## ——基于国际主流媒体新闻语料库比较视野

徐明华  
邓博艺

**【内容摘要】**在全球权力格局调整与传播秩序重构的交互作用下,中国政治术语作为文明叙事符号和国家理念话语,其国际传播正经历从单向输出到多维协商的深层转型,折射话语权博弈的典型症候。“术语滤网”路径模型揭示了政治术语国际修辞协商的三重过滤机制:在文本协商阶段通过译名符号调适进行语词过滤,在媒体协商阶段通过术语主题竞争展开语篇过滤,在社会文化协商阶段通过认知图式互文推动语义过滤,并以此启发关于译名失焦、主题偏移、图式非对称等术语协商困境的应对性策略。

**【关键词】**政治术语;国际传播;术语滤网;修辞协商

DOI:10.19997/j.cnki.xdcb.2025.07.001

中国政治术语国际传播是服务于新时代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事业的重要实践。国际新闻场域的话语秩序加速重构,推动国际传播竞争模式转向主体间建构,为中国话语突破西方议程垄断开辟战略机遇,倒逼国际话语传播的路径升级。在此背景下,中国政治术语承载着解码中国道路、诠释制度优势的关键话语功能,亟需通过文化转码和意义协商激活传播势能。<sup>①</sup>既有研究在术语翻译策略、传播渠道优化等策略建议层面取得进展,但多聚焦于静态分析,对术语传播过程中内核坚守与弹性适配的动态平衡机制尚缺乏系统性阐释,难以充分应对国际传播议程竞争复杂化、认知博弈隐蔽化的新语境。这一困境折射出更深层次的理论创新需求:西方话语分析框架难以有效诠释中国政治术语国际传播的独特逻辑,需立足中国话语主体性,构建兼具本土实践与全球治理的理论阐释体系。从协商视角系统考察中国政治术语的国际修辞协商机制,或可为提升中国话语的全球认同提

供策略支点,为国际传播理论的本土化创新扩展智识空间。

### 一、文献综述

#### (一) 中国政治术语:概念界定、意义张力及其国际传播研究

中国政治术语作为国家意志的语言表征,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文化土壤,是政策话语的权威载体,也是传统治理智慧的现代表达,在国际传播中兼具话语工具价值和文明对话意义。当前,中国政治叙事面临结构性悖论:经济文化议题的全球可见度持续提升,但政治议题的传播效能尚未充分释放。<sup>②</sup>这种落差印证了政治术语的国际传播战略价值,其不仅是解读中国发展道路的核心语义要素,更是重构国际话语秩序的关键支点,其传播效能直接关联国家软实力的系统性建构。<sup>③</sup>

政治术语的时空意义张力是其国际传播潜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人工智能的精准国际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2&ZD317)的研究成果。

能的核心来源。在历时维度上,术语演变呈现传统资源与现代价值的互文转化<sup>④</sup>,如“小康社会”概念既承袭《礼记》的民生理想,又注入脱贫攻坚的时代内涵,形成历史连续体中的意义增殖<sup>⑤</sup>;在共时维度上,术语建构体现本土智慧与全球治理的对话空间,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集群,构建集体主义导向的意义网络,与西方个人主义话语形成价值对照<sup>⑥</sup>。这种时空交织的辩证属性赋予政治术语独特的传播使命:既需维系本土价值的根脉传承,又要实现跨文化阐释的有效转化。<sup>⑦</sup>正是这种意义张力,使得政治术语在国际传播中既有望成为文化对话的桥梁,也可能因阐释偏差引发认知错位,这种内生性矛盾构成了驱动相关研究的核心命题。

国家权力重构与媒介技术转型,为政治术语的国际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面临合法性危机,中国通过亚投行、金砖峰会等多边机制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的传播,构建跨文明对话新平台。<sup>⑧</sup>数字技术革新叙事型式,短视频纪实使“脱贫攻坚”从政策术语转化为情感动员符号<sup>⑨</sup>,VR技术将“生态文明”具象化为可感知的生态图景<sup>⑩</sup>。然而在媒介赋能的另一面,中国政治术语国际传播效能呈现出非均衡分布的态势。例如,东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接受度显著高于欧美地区,传播效度与地缘政治亲密度呈现强关联性。<sup>⑪</sup>再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术语的媒体能见度呈现脉冲式波动,重大国际事件期间的曝光强度可达日常传播的三倍以上,暴露出术语议程延续性的内在局限。<sup>⑫</sup>

面对上述问题,学界围绕政治术语国际传播展开多重理论探索:符号学研究聚焦翻译策略的等效性,通过分析特定术语从直译到意译的演变,揭示语言转译的调适机制<sup>⑬</sup>;文化研究探索跨文化适应路径,尝试将本土概念嵌入多元价值参照体系以增强传播效能<sup>⑭</sup>;话语研究则通过批评话语分析,解构西方媒体对政治术语的意识形态化阐释<sup>⑮</sup>。相关研究版图日渐清晰,但仍存在

拓展空间。例如研究对象多聚焦术语的静态表征而忽视动态修辞过程,研究方法多倚重国别与媒体的横向对比而缺乏历时性追溯,学科交流则多停留于理论引用而未能形成有机的学术共同体。事实上,术语意义并非预先设定的常量,而是在多元主体的话语互动中持续演变的协商产物。这要求研究者突破局部变量分析的限制,以过程性、历史性和跨学科的综合视角考量政治术语在国际传播中的修辞协商机制。

在全球传播生态深刻变革的语境下,政治术语的意义张力凸显其作为政治对话关键纽带的战略性作用:既需要在政治话语博弈中维系价值刚性,又需要激活其跨文化传播的弹性意义潜能。国际传播的媒介技术革新推动政治术语从抽象符号向多元表达的形态演变,同时也加剧了传播效能的区域失衡和阐释偏差。推动政治术语研究向动态协商的认知转向,关键在于从中西对比中明确修辞协商的复杂机理,以多维视角建构兼具学理深度与实践效度的术语分析框架。

## (二) 中西镜像与理论突围: 比较视域中的政治修辞协商

中西政治修辞的差异根植于文明基因的深层特质,塑造了截然不同的话语建构逻辑。中国修辞传统秉承“言有物而行有格”的伦理取向,强调修辞的教化与社会整合功能<sup>⑯</sup>,西方修辞则源自古希腊法庭的辩论传统,发展出以说服为核心的技术理性<sup>⑰</sup>。这种本源性差异引发中西政治话语建构的路径分野,即中国政治修辞注重集体的意义共鸣,而西方则侧重个体的逻辑征服。值得关注的是,两者在实践维度存在深层共识,即将修辞视为兼具符号实践、传播行为和文化建构的三维统一体。这种认知交叠为跨文明修辞协商提供了理论接口,却也暗示着在实践层面难以规避的阐释权争夺。

中外媒体在中国政治术语的媒介表达上呈现出显著的修辞分野,这正是上述修辞差异在当代传播实践中的具体映射。有研究表明,中国政治话语善于运用“天下”“大同”等宏观意

象,通过互文策略将传统智慧与现代价值相融合,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既承袭儒家“和而不同”的理念,又回应全球治理的现实需求。<sup>⑩</sup>相比之下,西方政治修辞更倾向于使用“自由”“民主”等个体化概念,通过二元对立框架建构话语意义,如“美国优先”通过排他性修辞强化国家利益的第一顺位。<sup>⑪</sup>这种差异性在新闻话语中表现为“过程导向”与“结果导向”的不同选择,中国媒体注重使用历时性叙事展现事件全貌,而西方媒体则倾向于使用标签化表达进行即时价值判断。这导致中国政治术语在进入国际传播语境时面临结构性压力,即便保持术语译介的形式对等,仍可能陷入“语义孤岛”。

面对上述困境,对术语功能的回归性思考有助于启发中西修辞鸿沟的弥合路径。修辞学家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认为,术语是横亘在现实世界和个体思维之间的一个滤镜(filter),具备从科学认知到交际修辞的递进功能。<sup>⑫</sup>在科学认知功能中,术语是通过对现实世界的选择和偏离后形成的符号构成物,帮助我们间接获取知识,是认知世界的主要信息来源。<sup>⑬</sup>在交际修辞功能中,术语通过与他人共享某些“同一”的特质来消除认知分离、构成同体,为言说者实现话语动机提供可能。<sup>⑭</sup>这启示我们,术语既是认知现实的滤网,也是建构认同的桥梁。因此,中国政治术语在国际协商性转化中应实现双重适配,既通过选择性编码提炼具有人类共同价值指向的核心能指,又借助修辞性解码构建弹性解释框架,在保持价值刚性的同时,通过文化转译生成多元语义变体。

对比视野下的中西政治修辞存在传统路径差异,在媒介变革和国家权力博弈的叠加作用下,政治术语国际传播面临复杂的现实语境。在术语功能理论的启发下,本文认为政治术语承载着文明交流的深层意蕴,具备跨文化转译的符号潜能,推动其有效修辞的关键在于确立核心概念的基础转译规范,同时创新多模态意义呈现方式,以此构建跨文化术语阐释共同体。

为此,政治术语的国际传播研究不能拘泥于原子化的文本叙事,而应建立更符合政治修辞多元本质的分析框架。

### (三)方法谱系与在地转化:政治术语修辞协商的三阶分析框架

西方经典话语分析理论是构成本研究的方法论基础。1973年,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M. A. K. Halliday)提出语言元功能理论,突破传统语言学对符号表达的局限,通过概念、人际和文本的功能划分,将文本分析与社会认知维度相连接。<sup>⑮</sup>1992年,英国语言学家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提出批判话语分析框架,突破静态文本分析,融入文本实践、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动态视角。<sup>⑯</sup>1998年,荷兰语言学家梵·迪克(Teun A. van Dijk)提出宏观结构理论,借助命题结构和图式框架,将话语研究从微观语言分析拓展至社会权力结构的批判性考察。<sup>⑰</sup>上述理论演进呈现出西方经典话语分析的社会化、动态化和权力化三重特征。<sup>⑱</sup>然而,这种从文本功能到权力批判的范式跃迁,常囿于抽象理论与具象实践之隔膜而引发解释力断层,即缺乏对具体传播场景中权力博弈的动态印证,也未能形成适应中国政治话语实践的理论增长点。

为此,本研究提出政治术语修辞协商三阶分析框架,其核心突破在于引入媒体分析作为中观视野,通过媒体语篇连接多维性术语实践。具体而言,文本协商分析通过聚焦符号编码与概念转译的互构机制,厘清术语在语言学层面的意义协商逻辑;媒体协商分析通过多模态传播策略的话语动力学分析,<sup>⑲</sup>揭示媒体平台如何作为中介场域驱动话语权力动态竞争;社会文化协商分析,通过揭示认知图式与意识形态的互塑过程,解构话语协商背后的隐性权力博弈。由以上三个阶段形成递进式研究假设,文本协商完成符号意义锚定,媒体协商实现话语关系动态重构,社会文化协商则达成意识形态隐性形塑。这一框架着力于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传播经验的辩证对话,通过媒体维度的中介

性整合,形成连接语言符号实践与社会意识形态博弈的方法论路径。

本研究旨在通过建构涵盖“文本—媒体—社会文化”的协商分析框架,尝试破解中国政治话语分析中微观符号操作与宏观权力结构脱节的解释困境。基于此,本研究的核心命题是:中国政治术语如何通过三重维度的国际修辞协商,实现从概念输出到意义共生的范式转换?具体而言,政治术语如何通过符号重构和编码转译突破跨文化语义壁垒?如何驱动术语意义在国际舆论场的动态再生产?如何实现话语权力博弈从显性对抗到隐性渗透的策略升级?

##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构建与“政治术语修辞协商分析三阶框架”相匹配的研究路径。在文本协商分析维度,运用语料库语言学方法,对2013—2023年十年间中国代表性政治术语的英语新闻文本进行历时性分析,从术语密度、搭配模式等指标揭示文本层面的意义编码机制。在媒体协商分析维度,通过K-means主题聚类算法识别媒体报道的核心主题与衍生主题,考察政治术语在媒体场域中的意义再生产过程。在社会文化协商分析维度,运用批判话语分析方法,在建构主义立场上探讨术语传播的认知图式与权力博弈,分析术语如何通过修辞协商重构国际话语秩序。

在数据收集阶段,本研究以“中国梦”“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四个代表性中国政治术语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Lexis新闻数据库收集2013—2023年间相关英语新闻文本。数据收集采用Rvest语言辅助爬取,筛选范围限定为报纸、通讯社、新闻稿和网络新闻。最终构建包含8280条有效文本的语料库,其中“中国梦”1889条(CD语料库)、“一带一路”2005条(BR语料库)、“人类命运共同体”1879条(SF语料

库)、“中国式现代化”2507条(CM语料库)。

在数据分析阶段,本研究首先使用大数据分析平台DiVoMiner进行数据清洗与编码,按标题、日期、媒体等类目进行内容分析,生成时序折线图、词云图等可视化结果;其次,通过K-means算法识别媒体修辞主题,结合主题热力图进行对比分析;再次,采用文本情感分析模型Accuracy 0.8评估国际媒体态度,生成情感百分比堆叠图;最后,使用语料库分析软件AntConc 4进行语料对比,以British National Corpus(BNC)为参照语料,考察术语译名的语言型式特征,并通过语篇实践分析法<sup>②</sup>揭示术语传播的权力运作机制。

## 三、研究发现

基于自建语料库的历时性分析表明,中国政治术语的国际传播特征基本符合文本、媒体和社会文化三个协商阶段的划分假设。三个阶段在时间上呈现从文本调适到认知沉淀的演进轨迹,在空间上呈现从中国本土话语主导到全球语义网络建构的扩散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各阶段之间并非线性替代关系,而是通过语义增殖、框架竞合、认知重构等复合机制,形成螺旋上升的传播态势。

具体而言,在文本协商阶段,中国媒体通过对政治术语的概念编码和语义重构,完成初始意义的制度性确立,建构区别于西方现代性的话语坐标;进入媒体协商阶段,全球媒体对相关术语报道的框架竞争,推动阐释维度的多元演变,同时反映出中国媒体面临议程反向设置的话语阻力;至社会文化协商阶段,政治术语逐渐嵌入目标文化的话语体系,并超越表层语义争议,成为公共领域的自然话语(如图1、2、3、4)。三阶段划分的价值在于突破单纯时间序列的机械切割,转而以符号权力博弈强度为标尺,揭示政治术语从概念转译、意义竞争到认知内化的动态协商逻辑,为破解中国话语“传而不通”困境提供阶段性施策的理论图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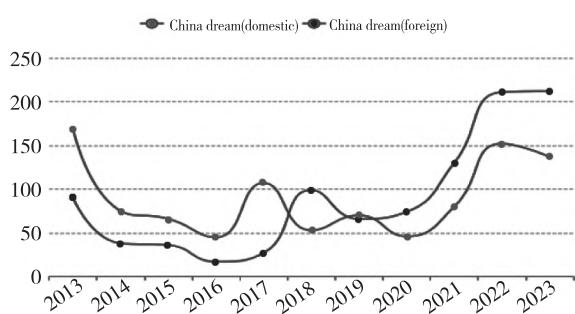


图1 “中国梦”英文报道数量发展趋势  
(CD语料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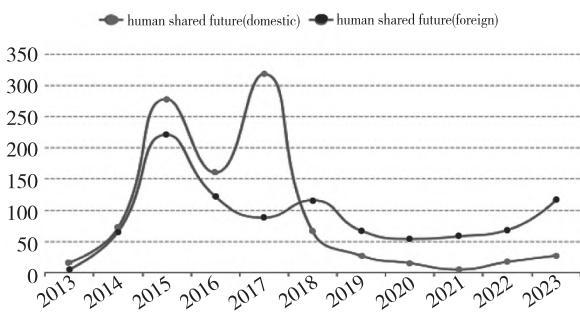


图2 “人类命运共同体”英文报道数量发展趋势  
(SF语料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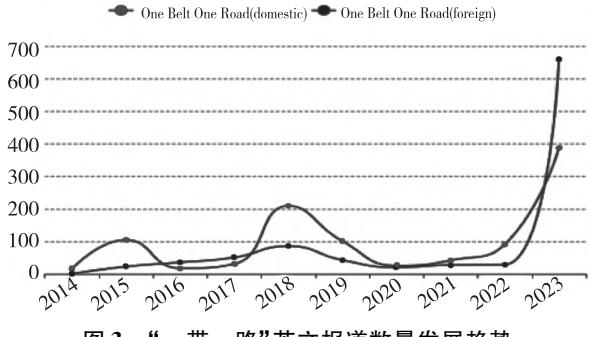


图3 “一带一路”英文报道数量发展趋势  
(BR语料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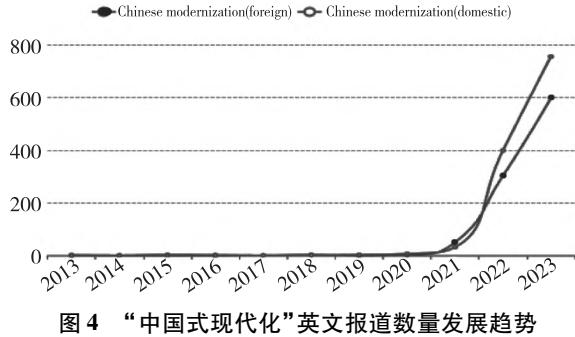


图4 “中国式现代化”英文报道数量发展趋势  
(CM语料库)

### (一)文本协商阶段:符号建构与语法配置的双重调适

中国政治术语通过国际媒体渠道进入全球舆论场域,开启传播周期的文本协商阶段。近年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重要讲话、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以及中俄、中美元首会晤等多边外交场合,“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等术语频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述多边外事活动不仅推动了中国媒体相关报道数量增长,也引发了国际主流媒体的议程跟进。研究发现,符号建构与语法配置的双重机制是支撑政治术语文本协商的核心逻辑。

在符号层面,通过名词化、抽象化和模糊化的赋名策略建构术语译名。纵观“一带一路”的术语转译过程,中文表达将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名词化为“一带”和“一路”的地理意象,降低国际受众的认知门槛;在此基础上,英文译名从直译的“*One Belt One Road*”演变为“*Belt and Road*”“*Belt & Road*”等抽象化形式,符合压缩词语长度以减少内容折损的传播规律;与此同时,官方确定使用译名“*Belt and Road*”,对术语的行为主体和实施条件进行模糊化处理,有效规避可能引发偏见的先验印象,有助于传递“和平发展”的政治价值。这种符号磨制有助于减少中国本土术语在国际新闻场域可能遭遇的传播阻力。

在语法层面,通过译名附件的习惯性伴随构建价值表达框架。本研究基于语料库统计方法,选取核心译名前后各五个字符进行索引分析,发现中国媒体在术语传播初期会形成特定的语法模式。这种习惯性伴随不仅通过语义网络展现特定政治图景,更为术语的跨文化转译提供语法支撑。<sup>⑨</sup>通过对译名附件词的显著度(中国媒体报道)排序和地域关键词的词频统计,本研究揭示了不同政治术语在使用语境与价值表达上的文本特征。

数据表明,“中国梦”与“rejuvenation”“envisage”等词汇的共现,体现了民族复兴愿景,其地域关键词如“Chinese Taiwan”“America/USA”的分布,反映了对国家统一和大国外交的

重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build”“humanity”等词汇的共现,展现了全人类视角的人道关怀,“Asia”“Africa”等地域关键词的分布,表明了对区域外交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关注。“一带一路”与“initiative”“cooperation”等词汇的共现,凸显了经贸合作的积极倡议,“Asia”“Europe”等地域关键词的分布,反映了区域协作深化和欧亚关系布局。“中国式现代化”与“opportunities”“model”等词汇的共现,体现了发展模式的示范意义,“Asia”“Africa”等地域关键词的分布,显示了友好国家对中国发展经验的关注。上述语词的习惯性伴随不仅塑造了术语的核心价值框架,还通过语义网络动态建构,实现了政治话语从概念阐释到实践指向的意义延伸。

政治术语的文本协商,在符号层面通过多重赋名实现术语概念重构,在语法层面通过习惯性伴随塑造价值表达框架,两者共同塑造了具有文化适应性的术语译名装置。这不仅为术语转译效果的评估提供了可操作标准,更深刻揭示了中国政治话语的独特表达逻辑,即通过意象叠加构建整体性意义网络,与西方话语中以逻辑论证为主导的线性表达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文本协商策略既确保了术语核心价值的稳定性,又为跨文化转译预留弹性空间,为后续媒体协商阶段的意义再生产奠定基础。

## (二)媒体协商阶段:主题锚定与意义衍生的动态博弈

随着政治术语译名结构的符号化定型,传播进程进入媒体协商阶段。此时,术语新闻主题作为连接政治术语制度性话语与新闻报道公共叙事的中介枢纽,成为议程竞合与阐释争夺的战略支点。中外媒体以主题建构为抓手的媒体互动机制,实质上构成了政治术语意义再生产的核心动力,通过对主题框架的争夺推动政治术语从制度文本到公共话语的升级。

研究发现,中国媒体在政治术语的国际报道实践中逐步建构出一套“核心—拓展”主题结构,核心主题聚焦政治价值的刚性表达,拓展主

题通过弱政治化叙事促进对话。以“中国梦”为例(表1),中国媒体通过“国家形象”“国家治理”等核心主题,阐释“中国梦”术语在对外形象优化、对内治理改革的坚定政治立场。同时,借助“青年教育”“生活健康”等拓展主题弱化政治叙事,促进国际对话。数据表明,核心主题以年均68%的语义网络密度增长维系术语价值内核,拓展主题以32%的非政治议题占比实现话语弹性延伸。

表1 中外媒体报道中的“中国梦”术语主题聚类及关键词

“中国梦”术语主题聚类及关键词(中国媒体)		
主题	关键词	数量
01 国际形象	国家、发展、全球、经济、总统、国际、北京	483
02 国家治理	党、中共、中央、委员会、国家、政治、治理、改革	261
03 国家统一	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书法、中国澳门、中国大陆、国家、北京、体制、统一	105
04 青年教育	青年、学生、学者、侨胞、运动、大学、国家、信件	99
05 生活健康	武汉、家庭、利物浦、林登、霍沃斯、书、生活、平凡、故事、太阳	52

“中国梦”术语主题聚类及关键词(外国媒体)		
主题	关键词	数量
01 国际形象	中国香港、人民、北京、城市、空间、政府、国家、中国台湾	379
02 国家权力	党、人民、共产党、国家、权力、北京	347
03 外交关系	孟加拉国、发展、合作、国家、巴基斯坦、英里、人民、大使、关系、友谊	120
04 军事扩张	印度、中国台湾、军事、北京、解放军、海、国家、边境	100
05 经济动态	增长、经济、美分、特斯拉、部门、房地产、利率、住房、投资者	54

研究发现,政治术语的核心主题传播过程呈现出中外媒体话语博弈的动态特征。中国媒体凭借新华社、中国日报等主流渠道,在有关政治术语的报道时效性上占据先机,但在新闻跟进和观点多样性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导致术语核心主题虽形成较早却缺乏语义延展性。与之相对,虽然外国媒体的报道启动相对滞后,但通过《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美通社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参

与,形成了更具议程影响力的术语核心主题。这一现象不仅折射出外国媒体依托其话语网络优势逐步掌握政治术语定义权的现实,更有可能强化国际受众对中国新闻话语单一性的刻板认知,进而影响中国政治术语的国际修辞协商效果。

相较于意义竞争,拓展主题则陷入更深层的对空言说困境。政治术语的拓展主题本应通过显性对话形式和隐性说服策略,实现跨文化语境下的术语意义协商。然而,实践表明中国媒体在青年教育、生活健康、经济动态等拓展主题的构建过程中仍面临多重困境:一是议程设置能力的结构性短板导致难以有效引导国际媒体关注预设的术语核心议题;二是主题选择与表达方式未能充分契合目标受众的文化认知框架;三是面对外国媒体对“一带一路”等术语的反向解读,缺乏及时有效的应对策略,在话语权争夺中持续处于被动地位。这些困境不仅制约了中国政治术语的国际传播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形象的正面建构。

上述“核心—拓展”型术语主题结构是中国媒体在政治术语国际传播实践中探索出的重要策略选择。核心主题通过高频复诵维系术语的价值刚性,拓展主题借助弱政治化叙事实现话语弹性延伸。然而,这种策略性考量在实践中面临显著挑战,中国媒体着力通过政治术语的主题设置构建价值认同,而西方媒体则借助框架置换实施符号权力反制。这种动态博弈不仅体现了传播主体间的策略互动,更折射出全球话语秩序重构中的深层张力。

### (三)社会文化协商阶段:认知图式与权力再生产的深层互动

随着政治术语国际传播进入社会文化协商阶段,修辞策略的重心已从主题建构转向更深层的认知塑造。该转向既是对前期术语主题叙事模式的延续,也是应对国际传播场域新挑战的必然选择。中外媒体通过不同话语图式展开新一轮的意义博弈,推动政治术语的价值阐释进入更为复杂的现实语境。

在这一阶段,中国媒体对政治术语的新闻

报道持续把握价值稳定性,而外国媒体更注重观点开放性。基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术语的实证分析发现:在报道数量上,外国媒体已超越中国媒体并保持稳定增长,2020—2023年间外国媒体年均报道量增长幅度显著高于中国媒体;在关注区域上,中国媒体绝大多数报道集中于中国本土,而外国媒体的视角更为多元,覆盖英国、泰国、巴基斯坦等20余个国家(图5、6);在文本情感上,中国媒体以积极叙事为主,前期积极情感占比维持在较高水平,但后期开始增大中立叙事的比重,积极情感占比显著下降,中立情感占比逐步提升(图7)。相比之下,外国媒体则呈现出以中立叙事为主导的特征,同时包含一定比例的负面叙事(图8)。这种差异化情感策略折射出中外媒体的深层立场:中国媒体通过语、义、韵的动态调整,从价值倡导转向平衡阐释;外国媒体则在规模化的中立叙事中持续嵌入负面元素,形成所谓“中立性批判”的话语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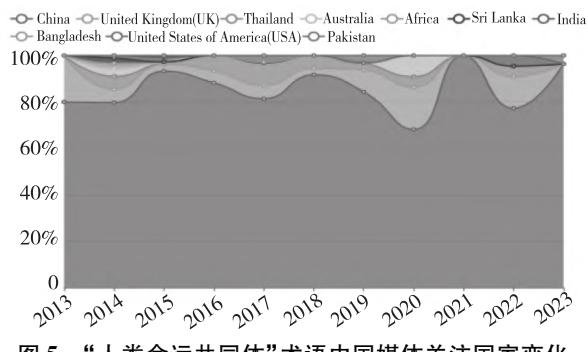


图5 “人类命运共同体”术语中国媒体关注国家变化  
(SF语料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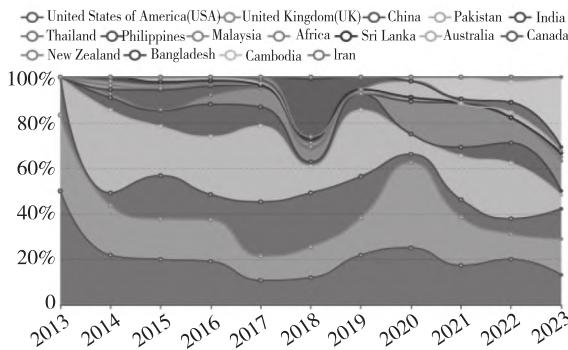


图6 “人类命运共同体”术语外国媒体关注国家变化  
(SF语料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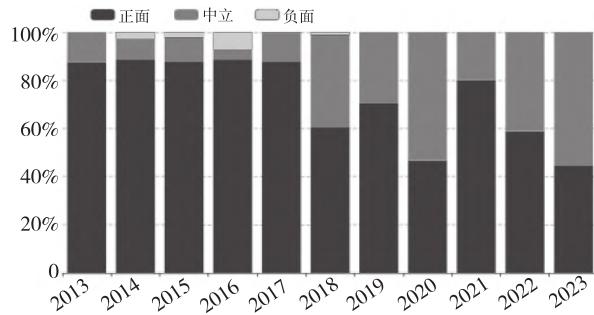


图7 “人类命运共同体”术语中国媒体报道情绪变化(SF语料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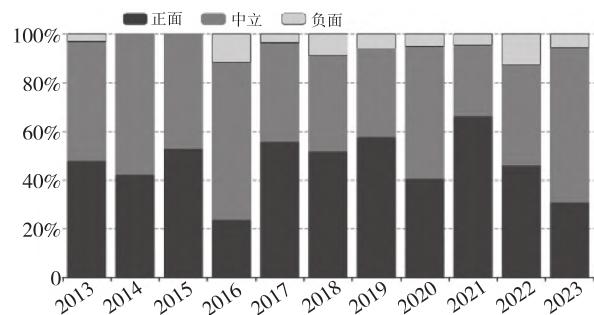


图8 “人类命运共同体”术语外国媒体报道情绪变化(SF语料库)

研究发现,中国媒体在政治术语传播中形成了两种具有本土特色的叙事图式:其一,话语集中图式,表现为传播主体集中于中央级主流媒体,报道议题聚焦国内政策实践,采用术语内涵阐释和现实佐证结合的标准化叙事模式,有助于确保术语阐释的权威性与一致性。其二,隐性推促图式,表现为降低正面叙事比例,采用第三方见证视角,塑造“核心—拓展”术语主题结构,在保持术语内涵稳定性的同时,嵌入文化遗产、科技创新等弱政治议题提升受众接受度,有助于增强术语传播的亲和力。这两种图式在确保术语价值稳定和提升传播动能方面各具优势,但也分别受限于话语主体单一性和文化适配粗放化等传播短板。

在推进政治术语的社会文化协商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反思自身传播策略的局限,更要警惕外国媒体互文开放性表象下潜藏的意识形态偏见。外国媒体倾向于通过精心设计的选择

性互文和框架重构策略,在报道主体、话题设置和观点表达等层面构建起表面中立、实则充满价值预设的话语体系。其具体表现为,倾向于借助所谓权威专家评论、科学数据对比以及客观民意调查等修辞手段,将中国政治术语纳入既定价值评判框架中。这种隐性的意识形态操纵提醒我们在借鉴国际传播经验的同时,必须保持清醒的话语自觉,既要识别其修辞策略的表里差异,也要防范其话语逻辑中的价值预设。

在政治术语的社会文化协商进程中,传播策略创新必须满足价值坚守与文化适应的双重要求。这需要中国媒体在构建跨国协作网络、深化议题本土转化、激活文化转译潜能等方面实现突破,同时警惕西方话语体系中的意识形态偏见,在跨文化对话中构建具有包容性的话语空间。这种实践不仅关乎具体术语的传播效能,更是中国话语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探索,其本质在于实现核心价值的创造转化和全球共识的动态构建。

#### 四、结论与讨论

##### (一) 术语滤网:一种贯通“语词、语篇、语义”的修辞协商路径

基于文本协商、媒体协商、社会文化协商三阶段的实证发现,为突破传统传播研究的扁平化局限,本研究构建了基于中国政治术语国际修辞协商机制的“术语滤网”路径模型(图9),旨在揭示中国政治术语国际传播的修辞协商机制。该路径结合国际传播的跨文化特质,将政治术语的国际传播过程解构为语词、语篇、语义三重过滤层级,形成一个具有时空纵深性的漏斗型协商系统。这一模型建构不仅表现了语言符号系统的自组织特性,更揭示了国际话语场域中意义协商的权力本质,同时也是对政治术语价值刚性与意义再生命题的理论回应。

在文本协商阶段,语词建构通过符号和语法的双重张力实现译名调适,前者将动态政治实践转化为稳定译名符号、确立阐释基点,后者通过

语义场域的习惯性搭建为跨文化阐释预留空间。这种刚柔并济的文本策略实质上构成了术语传播的元语言装置,其独特价值在于将术语多义性从传播障碍转化为意义协商的内在驱动力。通过策略性编码引导多元阐释趋向价值共识,不仅把握了符号的多义性特征,更将语言转译中可能引发的意义损耗转化为具有吸引力的他文化元素,为后续传播阶段的展开奠定语义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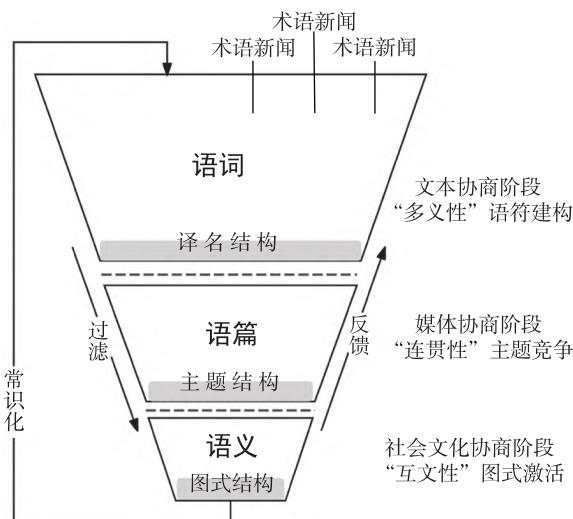


图9 基于中国政治术语国际修辞协商机制的“术语滤网”路径模型

在媒体协商阶段,术语传播呈现为媒体语篇实践的拓扑运动。中外媒体展开关于中国政治术语核心主题锚定与拓展议题衍生间的动态博弈,暴露出传播主体间性的深层矛盾:中国媒体致力于术语的内涵深化与外延泛化,而国际媒体则倾向推动术语的内涵异化与外延窄化。这种话语型构过程表明,政治术语传播效能不仅取决于对核心概念的坚守力度,同时依赖于转译过程中对解释框架的创新能力。当前存在的议程延伸衰减现象,本质上反映了跨文化解释共同体建构的滞后。为克服这一困境,需要在保持术语主题连贯性设置的同时,着力破解核心主题的集中困境和拓展主题的对空难题,同时警惕媒体竞争中的话语陷阱。

在社会文化协商阶段,术语传播升维至语

义权力的动态建构。当术语认知态度经由反复确认形成互文共识时,其传播便指向认知图式的权力再生产。中国媒体在实践中形成的集中性话语策略虽强化了术语认知的统一性,但过度依赖制度性传播路径可能导致术语转译的创意缺失。这种结构性矛盾提示我们,术语滤网的沉淀效应不仅需要语义网络的密度支撑,更取决于边缘语义与中心话语的良性互动。通过激活术语认知图式的互文特征,并以常识化路径反哺术语滤网整体优化,可以实现传播效能的持续提升,推动中国政治术语在国际话语场域中实现更深层次的文化嵌入。

事实上,术语滤网的各层级之间并非单向传导关系,而是存在多维度的反馈回路。具体而言,语篇层的话语竞争可能逆向重构语词层的编码策略,语义层的认知偏差又会催化新一轮的文本协商。这种动态平衡机制不仅为理解术语传播的异化现象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解释力,也为诊断传播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开辟了新的分析维度。在实践层面,术语滤网的机制运行仍面临译名失焦、主题偏移、认知图式错位等诸多挑战。这些问题既生发于各层级内部的过滤机制,也源自层级间能量传导的路径阻塞。因此,对术语传播效度的评估必须建立在对三层级耦合关系的系统性考察之上。

## (二)失焦、偏移与非对称:话语权力场域中的术语协商困境

中国政治术语的国际传播始终处于结构性张力之中,既要维系术语核心价值的刚性内核,又需应对跨文化修辞的弹性需求。这种张力本质上折射出国际话语场域中的权力格局:发达国家凭借其话语网络优势占据传播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面临话语权失衡的困境。为此,本研究提出基于中国政治术语国际传播修辞协商机制的“术语滤网”路径模型,通过三重过滤层级的动态互构,揭示这种结构张力作用下的传播机理。分析发现,当前中国政治术语国际传播实践中突出的译名失焦、主题偏移、图

式非对称等协商困境,实质是滤网机制在特定权力场域中的适应性反应。

在语词过滤层,术语译名的流变既是概念完善的必要过程,也可能带来译名失焦的现实隐患。研究显示,中外媒体普遍存在对同一中国政治术语使用2至3种不同译法的现象,这些译名虽然共享相似的核心词汇,却展现出各异的表达方式,影响了术语在国际传播中的清晰度和准确性。这种术语失焦现象可能源于语言转译的不确定性、官方翻译标准的缺失,以及传播过程中有意或无意的术语误读。尽管这些译名会随时间推移逐渐趋于一致,但其间的意义损耗已对术语修辞协商造成实质性影响。

为此,需加强术语转译和传播的背景性调研,统合学界与业界力量,建立规范的译名筛选机制。具体而言,可以通过构建多语种平行语料库,开展目标语境的接受度预调研,制定分级术语翻译标准等方式,在确保术语核心价值的同时,提高译名的稳定性和接受度。这种前置性术语规划不仅能够降低译名流变带来的认知成本,也有助于增强术语传播的系统性和连贯性。由协同化译名建构机制编制而成的基础语词网络,既能够有效筛除过度偏离的能指异变,又能通过伴随语法的弹性连接,为合理的意义延展预留必要空间,从而实现术语传播的精确性与适应性动态平衡。

在语篇过滤层,政治术语的主题结构面临着差序衰减和路径重构的双重偏移。“核心—拓展”主题结构的传播效能验证了术语滤网中的媒体协商的有效性。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术语传播为例,中国媒体构建的核心主题聚焦于全球治理改革与文明对话,通过高频共现词群(如 *multilateralism*, *win-win cooperation*)形成语义引力场;拓展主题则延伸至“疫苗合作”“气候变化”等具体领域,搭建价值理念与现实情境的连接桥梁。该术语在亚非国家媒体报道中,核心主题语义保持率良好,拓展主题衍生出17个子议题;而在欧美主流媒体中,核心主题被重构

为所谓的“地缘扩张工具”,拓展主题则被简化为个案报道的标签化符号。这种显著的传播差异揭示了术语滤网在语篇层的独特权力规制。

上述现象表明,主题结构的协商效能与对象国的地缘政治亲密度呈正相关,正在形成以中国为中心、按战略伙伴关系向外辐射的同心圆效应。因此,语篇过滤不仅是信息筛选,更是意义协商的过程,当《纽约时报》将“新型国际关系”(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核心主题置换为“中美战略竞争”框架时,实则是通过议题重构实施符号权力反制。因此,术语滤网的语篇过滤机制需超越单纯的信息传播维度,转而关注话语主体间框架争夺的动力学过程。

在语义过滤层,中外媒体的术语认知图式呈现非对称生成态势。研究显示,“一带一路”术语的国际认知图式呈现显著的区域分化:在发展中国家媒体话语中,其与“基础设施建设”“区域赋能”形成强关联,建构出“发展范式创新”的积极认知;而在部分西方媒体中,该术语被嵌入“政治宣传”“经济操控”的负面语义韵。这种认知鸿沟印证了语义层的过滤限度,当术语传播进入文化认知深水区,既有的语词、语篇过滤成果可能遭遇认知惯性的消解。这种非对称性不仅反映了文化认知的差异,更深层次地揭示了国际话语场域中的权力结构失衡。

破解这一困局需要创新术语滤网机制的协同模式。为此,处于术语传播早期的“中国式现代化”术语可以尝试开展以下前置性布局:在语词层确立 *Chinese modernization* 这一译名形式,采用名词短语的语法结构既保持术语的完整性和辨识度,又避免 *Chinese-path* 等表述可能引发的文化隔阂;在语篇层打造“和平发展”“绿色环保”等主题叙事,通过结构性叙事布局,既突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又将其与全球议题相连接,增强术语的普适性和亲和力;在语义层培育“现代化道路多样性”的认知图式,通过对比不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共性与特性,回应和克服所谓的“制度输出”“模式竞争”

等负面认知。以上三个层次相互支撑、动态调适,有助于形成政治术语国际传播的良性回路。

本研究立足中国政治术语国际传播的十年实践经验,具象建构“术语滤网”修辞协商的路径模型,揭示政治术语在国际传播中实现价值内核刚性与文化适配弹性的动态平衡机制,是中国政治话语理论体系的创新尝试。在去中心化国际传播格局中,该模型展现出显著的理论潜力,其运作机制正从垂直层级的线性过滤,转向多节点联动的网状协商。这种转型不仅呼应全球传播生态的结构性变革,更在深层上折射

出中国话语体系构建范式从“防御性调适”向“主体性协商”的战略升级。未来,中国政治术语的国际传播研究亟待突破文化折扣的被动叙事窠臼,转而聚焦协商效能的生成机制创新。当国际传播与人工智能算法解析、神经科学认知图谱等技术前沿展开深度对话,或可催生术语传播的“第三空间”,在技术可供性与文化主体性的辩证互动中,实现从话语权力博弈到意义协商共建的范式跃迁,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具包容性的中国智慧。

【责任编辑:张毓强】

#### 注释:

- ① 徐明华、邓博艺:《政治术语的国际传播效能提升刍议》,《对外传播》,2023年第2期,第23页。
- ② 史安斌、王曦:《从“现实政治”到“观念政治”——论国家战略传播的道义感召力》,《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第24期,第17页。
- ③ 徐明华、邓博艺:《赋意、疏通与形塑:数字变革中的政治术语国际传播路径创新》,《对外传播》,2024年第9期,第19页。
- ④ 周庆安、刘勇亮:《多元主体和创新策略: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国际传播叙事体系构建》,《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21期,第24页。
- ⑤ 李兵:《话语创新与思维创新——我国落后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话语”分析》,《思想战线》,2003年第4期,第19页。
- ⑥ 张毓强、潘璟玲:《国际传播的实践渊源、概念生成和本土化知识构建》,《新闻界》,2021年第12期,第49页。
- ⑦ 程曼丽:《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人民日报》,2024年11月22日,第9版。
- ⑧ 徐明华、李虹:《认知宰制的三重解码:国际舆论“武器化”的致效机理研究》,《现代传播》,2024年第8期,第62页。
- ⑨ 杨奇光、王诗涵:《数字时代国家叙事的话语创新与理论拓深——基于中国“脱贫攻坚”重大主题报道的考察》,《新闻与写作》,2023年第5期,第103页。
- ⑩ 王沛楠:《从国际传播到战略传播:搭建中国故事的阐释共同体》,《现代视听》,2021年第8期,第10页。
- ⑪ 吴明华、赵飞格:《国际互联网用户参与国家声誉管理的话语实践——维基百科“一带一路”倡议词条的个案研究》,《现代传播》,2024年第8期,第92页。
- ⑫ 许文胜、方硕瑜:《“人类命运共同体”英译在英语社会的传播与接受——基于G20国家新闻报道的研究》,《当代外语研究》,2020年第4期,第94页。
- ⑬ 李田心:《论“中国梦”的英译和 American Dream 的汉译》,《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83页。
- ⑭ 朱桂生、黄建滨:《美国主流媒体视野中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基于《华盛顿邮报》相关报道的批评性话语分析》,《新闻界》,2016年第17期,第60页。
- ⑮ 张丽霞:《政治话语隐喻英译研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为考察中心》,《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第156页。
- ⑯ 胡范铸:《从“修辞技巧”到“言语行为”——试论中国修辞学研究的语用学转向》,《修辞学习》,2003年第1期,第5页。
- ⑰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修辞术·亚历山大修辞学·论诗》,颜一、崔延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 ⑱ 赵启正:《由民间外交到公共外交》,《外交评论》,2009年第5期,第1页。
- ⑲ 谭学纯:《政治修辞:中西对比镜像——兼谈修辞学术生产隐蔽的问题》,《海峡人文学刊》,2023年第1期,第157页。
- ⑳ Kenneth Burke. *Language as Symbolic Action: Essays on Life, Literature, and Meth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p. 32.
- ㉑ 王志伟:《从戏剧主义与术语视屏看博克的语言哲学思想》,《外国语文》,2012年第4期,第61页。
- ㉒ 鞠玉梅:《肯尼斯·伯克新修辞学理论述评:关于修辞的定义》,《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75页。
- ㉓ David Banks. *A 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 of English: A Simple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p. 81.
- ㉔ Norman Fairclough.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2010. p. 13.
- ㉕ Teun A. van Dijk. *Narrative Macro-structures*. PTL: A Journal for Descriptive Poetics and Theory of Literature, vol. 1, 1976. p. 562.
- ㉖ 胡春阳:《传播的话语分析理论》,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20页。
- ㉗ 韦琴红:《论多模态话语的整体意义构建——基于一个多模态媒体语篇的话语分析》,《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第19页。
- ㉘ Norman Fairclough. *Analysing Discourse: 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2003. p. 95.
- ㉙ John Firth. *A Synopsis of Linguistic Theory, 1930-1955*. In *Studies in Linguistic Analysis*. Oxford: Philological Society. 1957. p. 26.

(作者徐明华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邓博艺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